

海外智库中的新华人学者与中国“软力量”建设

王 健

内容提要：从 1978 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整整三十周年了。三十年来，一批又一批神州学子负笈海外。他们当中，有不少学成归来，成为当前国内众多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留在海外继续发展，形成了海外智库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在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心存困惑和忧虑的情况下，这部分学者以其特有的双重学术背景帮助西方社会客观地认识 and 解读中国的发展，在中外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共分四部分，分别探讨海外智库中新华人学者群的概况、海外智库新华人学者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海外智库新华人学者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就进一步发挥海外智库中新华人学者的作用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海外智库 新华人学者 软力量

作者简介：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海外智库中新华人学者的概况

“智库”是当前我国不少学者热议的话题，它源自英文“Think Tanks”，也称“思想库”或“脑库”，中国传统上称之为“智囊团”。这一称呼主要源自二战后的美国，一开始是纯军事用语，用来描述军事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之间探讨军事战略的场所，后来逐渐演变为“泛指一切进行未来规划性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非赢利性研究机构”。¹ 一般认为，“智库”往往具有组织性、独立性、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性等特点。本报告也采用了这种较为宽泛的定义，本文所谈论的“海外智库”主要是指大陆和港、澳、台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人

¹ 林芯竹著：《为谁而谋，美国思想库与公共政策制定》，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7 年出版，第 1 页。

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包括高等院校、独立研究机构、隶属于高校和政府的研究机构以及研究型基金会等。同时，由于海外智库系统极其庞杂，名目繁多，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就所有的海外智库进行统计和研究，故而选取了美国和新加坡作为分析重点，兼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提高研究分析的深度和针对性。本文中的“新华人学者”²，主要是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走出去的一批海外留学人员中，选择留在海外进行发展并且在上述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工作的学者。

中国海外智库新华人学者的形成，始于1978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根据2008年4月教育部发布的统计，从1978年到2007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1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外的留学人员有89.20万人，其中65.7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³ 这些海外留学人员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由教育部或原工作单位提供海外学习费用，他们大部分往往会选择学成回国。但是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相当一部分选择留在了海外；第二类是访问学者和短期学术访问的学人，他们基本上由研究项目、基金会或有关部门提供出访交流的基金，这部分基本上都会选择回到国内；第三部分是自费或取得国外大学奖学金的留学生，这部分留学生占海外留学人员的绝大多数，并且很多选择留在了海外发展。虽然我们目前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总数也已相当客观。据估计，在美国大学和智库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学的华人学者不少于300人；还有人说，在智库和大学政治学和国关

²我国学者周南京认为，“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而华人是“泛指具有中国血统者，今专指加入外国国籍华人的简称。”²然而，这一界定更多是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将二者进行严格的划分。我国另一著名华侨研究学者庄国土主张使用“华人新移民”的概念，用以指称“20世纪后期跨国移居的华人”。²不过这一概念以时间为节点，不仅涵盖了移居海外的大陆华人，还包括其他地区跨国流动的华人。本文所谈论的“新华人学者”，主要是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走出去的一批海外留学人员中，选择留在海外进行发展并且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学有所成者。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华人”，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获得所在国的国际，至少获得了所在国的永久居留权。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新华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既不同于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华裔学者，而是具有大陆的生活背景和体验；也不同于七十年代之前远赴海外定居华裔学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过新中国的教育与学术训练，具有中西双重的学术背景和社会生活体验。

³ “教育部公布2007年度各类留学人员情况统计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08年4月8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13.jsp?tablename=2398&infoid=1212647247174102>

领域任助手以上职务的大约有 200 多人，⁴ 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海外智库新华人学者的分布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他们的留学深造的去向，因为留学往往会是他们接触和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桥梁；另一个是他们客居地国家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程度，这将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机会和生活工作条件。就留学去向来说，美洲、日本、欧洲和澳洲是三个主要去向。如果说，早期留学生的较广分布，是国家教育行政机关有计划作为的结果，那么近年留学国家选择的多元化，则更多的是国内教育投资者对各国教育质量、教育成本、教育环境、准入难度、就业前景等进行综合判断而做出的决定。

就客居地的开放程度和社会环境而言，美国、日本是中国留学生比较容易扎根发展的地方。以美国为例，由于其宽松的人才吸引机制和政策，包括相对开放的社会工作环境，留美学生学成后，除部分回国外，继续留学从事研究和工作的人数较多，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更是如此。据统计，从 1978—1995 年，中国内地赴美留学学者近 13 万人，回归率在 20% 以下。近年这个比例已大为提高，但每年仍有相当比例的人进入美国社会。加上每年通过 H1 签证吸收的年轻学者，美国成为海外中国人才最大的集散地。教育部公布的 17 万多在外学者，美国有 10 万人之多，超过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的总和。⁵ 针对西方社会的学术“玻璃天花板”现象，新华人学者李成、黄靖、裴敏欣在接受采访时都曾指出，“偏见和压力在哪里都有，美国的体制相对公平、公正，只要自己努力，真有能力，终归会得到承认的。”⁶ 东南亚的新加坡因为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虽然面积不大，但由于社会文化相近，社会环境宽松，同样吸引了一大批新华人学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都有不少留学欧、美、日、澳的新华人学者担任教职。

⁴ “直面美中冲突，中国研究热华人学者崭露头角”，中评社香港2007年5月2日电。

⁵ 魏能涛：“世界教育市场争夺中国留学生”，（香港）《紫荆》2005 年第 1 期。

⁶ “直面美中冲突，中国研究热华人学者崭露头角”，中评社香港2007年5月2日电。

海外智库中新华人学者群的研究领域极其繁杂，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金融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国际关系学等几乎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即使单就人文社科领域而言，我们也不可能穷其所有。从总体来看，海外智库中新华人学者的研究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纯粹的专业理论研究和以国外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比如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美国史、欧洲史研究等；第二类是在专业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兼顾中国问题研究，比如美国杜克大学的高柏教授，在研究经济社会学的同时，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也很有建树；第三类是在海外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不少新华人学者利用自身的双重文化身份优势，用国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建树非凡。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观察，海外智库新华人学者都已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群体。他们的成功，应当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是他们自身的较高素质。在改革开放之初，能够到海外留学深造的学生，多是国内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读大学的则往往是国内的优秀中学生。在美国，中国内地学生攻读研究生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80% 上下。这个比率，是世界各国、各地区所有在美学生中是最高的。有学者指出，中国学人在美国大学获得终身教授的成功比率，相对较高，约 60% 至 70% 左右，“因为中国人在科研与教学能力上，大多高于美国教授的平均水平”。⁷

其次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溢出效应”益加明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日益增多，纷纷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力度。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具有双重文化背景和学术训练的新华人学者更是倍受青睐。在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大学和智库，美国著名智库卡耐基和布鲁金斯学会还分别在中国国内开设了研究分部。据估计，2004 年大华盛顿地区自称专门进行中国研究的学者、说客和咨询人员大约有 700 多人，2007 年已骤增到 1200 多人。据估计，全

⁷ “中国学者挺进美国各大学高层”，全球华人专业人士网络 2002 年 12 月，
<http://www.networkchinese.com/region/north/tahigu.html>

美最好的 100 所大学内，大约有 300 到 500 位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学者。卡耐基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裴敏欣也指出，8 年多来美国的“中国热”呈现几何级的变化，这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息息相关的。⁸ 除了智库和大学之外，美国主要部委、军队大兵种都有中国研究专项，一些跨国公司也设有中国项目或者中国部门。2007 年，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在伦敦举行仪式，宣布联合成立中国研究中心，旨在使英国的大学拥有可与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竞争的中国研究中心。⁹

最后是海外华人学者“规模效应”的集中体现。留学海外的华人学者经过三十年的积淀与发展，已经步入了学术成就开始集中体现的阶段。美国西彻斯特大学华人副校长洪朝辉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自 8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美学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是求学阶段，时间在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中国学人大多在这一阶段“寒窗苦读”，并在 90 年代初成功获得各类博士学位。第二是求职阶段，时间在 9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他们大多顺利地各在大学、科研机构和公司企业得到工作机会。第三是求发展阶段，时间在 90 年代中至 90 年代末。在此期间，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大学终身教授或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第四是求突破阶段，时间在 21 世纪初，不少人如今都已获得所在国的国籍，在高校或科研机构拥有稳定的教职。¹⁰

二、海外智库中的新华人学者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新华人学者群不仅是一个刚刚形成的社会群体，也是一个相对独特的社会群体。正是这种独特性，使他们能够发挥一种与众不同的作用。简单来说，新华人学者的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重文化背景。新华人学者大都出生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出国深造，学有

⁸ “‘中国研究热’升温，美国‘吃中国饭’人数增多”，《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 年 5 月 7 日。

⁹ 马建国：“英国三所大学联合成立中国研究中心”，新华社伦敦 2007 年 6 月 27 日电。

¹⁰ “中国学者挺进美国各大学高层”，全球华人专业人士网络 2002 年 12 月，
<http://www.networkchinese.com/region/north/tahigu.html>

所成。他们大多出生在五六十年代，既有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末期的社会体验，也有对中国改革初期的社会体验。这种经历使他们对中华民族追求富强之路的崎岖与艰难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也使他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出国深造机会。正是这种社会体验和文化背景为他们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原始的素材和动力。不少学者到了海外以后，仍然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更多的学者尝试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来探索中国的发展与富强之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议题中即可以看出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新华人学者李成曾说：“华人学者对两国都很熟悉，善于运用容易让对方听众理解的语言来表述观点，更容易促进两国的沟通和交流。”而同在布鲁金斯学会的黄靖也表示，“中国崛起，华人学者跟着吃香；在美国搞中国研究，最在行、最有潜力的还是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华人。”¹¹ 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则认为：“华人学者的中国阅历和背景，使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感知能力更强，了解中国信息的管道更多样化，更能理解中国人的视野和思维，同时他们对美国制度运行也有很好的感觉，因而能为促进中美相互了解发挥更大的作用。”¹²

二是双重学术训练。新华人学者基本上都接受过国内外双重学术训练，具有双重的学术背景。不少人出国前就已在国内著名高校获得了学位，或至少是在国内重点中学接受了教育。国内的学术训练一方面使他们具备了较强的竞争能力，能够在国外的发展过程中很快脱颖而出。有人统计，2006 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中，中国大陆有 4236 人，韩国 1510 人，其次是印度 1479 人，中国台湾 609 人，加拿大 533 人，土耳其 430 人，日本 240 人。其中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毕业生为数众多。¹³ 另一方面，国内外的双重学术训练也使

¹¹ “直面美中冲突，中国研究热华人学者崭露头角”，中评社香港 2007 年 5 月 2 日电。

¹² “直面美中冲突，中国研究热华人学者崭露头角”，中评社香港 2007 年 5 月 2 日电。

¹³ 陈光第：“中国盛产美国博士？”，价值中国网 2008 年 9 月 9 日，

他们对国内外教育制度的差异有着切身体验，并使他们和国内学术机构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感情和学术联系。

新华人学者在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首先在于他们独特的身份，这种身份使他们可以进退自如地发挥居间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比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美籍华人学者没有西方外交家的政治面纱，就重大问题在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大陆人士之间斡旋，显得较为容易。”这种身份，使他们在与中国官员会谈时，“可轻易地跳过中美友好的说辞，而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均可直接表达对双边问题的看法。”¹⁴ 由于美籍华人学者努力调解两个意识形态对手之间的尖锐分歧，他们的劝谏影响会渐传至两国的高层政策制订者。其次在于独特的社会地位，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新华人学者都拥有一定的官方和半官方学术职位，这种独特的社会地位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关系和他们的讲座、著作以及与中国大学生和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员建立的个人联系，展示了他们促进跨国关系（理解）的影响力。”¹⁵ 最后是他们的学术影响力，良好的高等教育和专家背景使新华人学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影响舆论的能力。他们通过出书、撰文；电视访谈、政策点评；学术报告、国际会议等各种途径分析时事，解读政策，往往会形成或是改变社会舆论，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创造条件。不少新华人学者曾兼任一些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拥有自己的固定读者群。

除了直接参与双边关系建设之外，更多的海外新华人学者还直接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成为中国跨文化网络的重要节点与环节。我们在对海外智库新华人学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90%以上的新华人学者都积极参与了和中国大陆的学术交流，不少人还在国内拥有很高的学术职位。今年来教育部设立的“长江学者”计划中，引进的大部分“长江学者”都是海外新华人学者。他们通过自身和国内外学

<http://www.chinavalue.net/NewsDig/NewsDig.aspx?DigId=20436>

¹⁴ 沈敬国：“论争、调和与合作间的传播交流：美籍华人学者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作用刍议”，载孔秉德、尹晓煌主编《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新华出版社，北京，2004年出版，第129—133页。

¹⁵ 沈敬国：“论争、调和与合作间的传播交流：美籍华人学者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作用刍议”，载孔秉德、尹晓煌主编《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新华出版社，北京，2004年出版，第130页。

术单位的职务与联系的便利，他们在推进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欧洲经济学与统计学研究中心（E-cares）排出的全球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曾有19人来自中国，其中的12位都受聘于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大部分都有曾经来华讲学的经历。

一般来说，新华人学者参与学术交流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

I. 应邀来中国进行讲学或作专题讲座，这是大多数学者最为常见的交流方式；

II. 担任中国大陆学术与科研机构的教职或高层管理人员，比如担任某些高校的“特聘教授”、“长江学者”，或是担任院系乃至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

III. 推动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学术交流联系，比如进行访问学者交流、建立联合培养项目，或是联合进行调研和科研项目，乃至合作办学、建立共同研究中心等；

IV. 参加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性学术交流，主要是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和社会文化活动，这也是较为的常见的一种学术交流。

新华人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无论是对于国内学术机构提升和发展其国际影响力，还是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国家建设方面，留学人员对国外的社会制度有着切身体验，可望在制度的创新与制定、理论的突破和完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实际上，90年代以来，在思想理论界有关国家未来改革走向的辩论中，他们已经做出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和理论建树。与其他同代人相比，他们“对当代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较为理性的思考、判断、选择、取舍和反省，少了某些时候部分人那种全盘西化的偏颇和生吞活剥的浅薄。”¹⁶

文化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新华人学者在积极帮助引进西方先进社会与文化理念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往华人在海外的民间团体，基本上以“同乡会”、“同窗会”、“华侨总

¹⁶ 魏能涛：“中国学子持续留美的积极效应”，（香港）《紫荆》2005年第12期。

会”等为主。随着拥有较高学术教育背景的新华人学者群的出现，一些华人学术性团体开始迅速发展壮大。比如留美学人 1990 年成立的“1990 学社”明确提出，旨在“促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理解，并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通过独立、客观、策略性的学术研究，最终促进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和平与繁荣。”¹⁷ 从 1993 年开始，学社先后邀请著名美国经济学家执笔，组织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方面的中英文著作，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在改革与发展方面的成就。1995 年成立的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学会在推动跨国学术交流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会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美国与中国社会转型方面的著作，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在日本，1986 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有 500 多成员，是中国人 在日本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学术团体之一。除此而外，海外新华人学者往往还运用自己的外语能力积极进行外文写作。据有关统计，在 1990~1998 年，在日华人学者的著述多达 400 多册。而他们的日语著述，由过去的资料为中心、单纯介绍为主、转向有独自分析和见解的著作；由介绍中国历史文化转向经济政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指出“现代留日中国人的日语著书，翻开了日中文化交流新的一页，而且对于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海外智库新华人学者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关于中国“软实力”构成，目前国内学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其主要根源还在于学界对“软实力”的构成本身仍存在分歧。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以门洪华博士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中国的软实力主要包含如下核心要素：I. 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尤指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等精神财富。II. 观念。III. 发展模式。所谓发展模式，“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IV. 国际制度。

¹⁷ 吴宁华：“改善大陆社会状况和美中关系：四个由华裔美国人领导下的跨国协会个案研究”，载孔秉德、尹晓煌主编《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新华出版社，北京，2004 年出版，第 220 页。

制度是“软实力”的重要支撑。一般而言，国家制度建设也是“软实力”研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制度创新使一个国家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政治收益。V. 国际形象。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对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要素的一种综合认识与评价，是一个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关于该国的意志、决心和能力的印象，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正是根据这一印象来回应该国的行为并藉此预测其未来行为，特别是在战略博弈中以此作为预期和反应的依据。¹⁸

“软实力”问题之所以近年来会成为国内学者非常关注的话题，其根源就在于它与新世纪中国崛起紧密相连。中国崛起与新一轮的全球化与国际体系转型几乎同步发生。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实力转移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超常规、跨阶段发展的可能，也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新世纪的国际体系转型虽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原来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大国对中国的疑虑、担忧和压力都在增加。面对当前的“崛起困境”，不少学者都在探索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路径，其中之一就是“软实力”建设。

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一国的“软实力”建设意义重大，而智库的在这方面更是发挥着独特作用。¹⁹ 本文认为，海外智库中的新华人学者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I.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帮助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新华人学者无论是来中国讲学，还是在中国国内学术机构兼职，或是推动联合项目的建立等，都有利于把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管理理念、学科前沿、领先技术等引入中国，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升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与此同时，长期居住在海外的新华人对国际社会的一些机制、法规、运作等更为

¹⁸ 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¹⁹ 一般来说，海外“智库”的社会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培养或影响专业人员直接到政府供职；第二，出版刊物、著作或提交报告，特别是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专门报告；第三，利用大众媒体形成或影响、引导社会舆论；第四，为政府等决策部门释放政治信号，进行前瞻性试探；第五，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与政界、商界、民间进行互动，对政府决策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了解，他们的积极参与可以帮助中国更加有效地参与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更好地参与国际机制及其规范，便于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II. 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新华人学者的往返穿梭和海外努力，有助于全球华人网络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提升海外华人社团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增强中国民族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他们运用西方学科方法和学术规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和传播，包括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和诠释，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发展，并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III. 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增进中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进而实现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新华人学者是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一支“特种部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更能为国外社会所接受，从而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估中国。近年来，关志雄等对海外“中国威胁论”的回击，张维为、郑永年等对“中国模式”和“中国民族主义”等问题的认识，都在改善中国海外形象，促进中外交流和理解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海外智库中的华人学者通过他们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外关系的发展，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利益提供帮助。

总体来说，海外智库中的新华人学者影响和推动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

I. 在海外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每一位置身海外的华人都是一张中华民族的“名片”。对于这些海外新华人学者来说，他们更是一张张印制精美的“名片”。不少工作在智库中的海外新华人学者本身就是在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管是在基础性的哲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还是在应用性较强的经济学、社会学、金融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都以自身的言行举止传承与弘扬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他们通过在海外

的言传身教，更是把一个个完整而真实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传播给了外部世界，并激起更多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认同。

II. 为中国的国内制度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著书立说。不少新华人学者在国内一些政府机构担任兼职顾问，直接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建言献策，策划运筹，比如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科学院、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机构都拥有一定的海外新华人学者作为顾问和外聘专家。

III. 推动国内学术单位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参与中国的科技研发与教育文化建设。新华人学者虽然留学国外，但他们大都与国内的母校和学术单位联系密切，积极推动中外学术交流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同时在国内外学术单位兼职，常年往返于中国大陆和居住国之间，成为中外学术交流活动的积极推动者。新华人学者在推动中外学术交流方面的形式非常多样化：通常包括来中国大陆讲学、兼任特聘教授和访问学者，比如许多高校设立的“长江学者”职位。此外，还有组团访问、推动设立联合培养项目和交流合作项目等等。I

V. 开展“民间外交”、“学术外交”等“二轨”外交，担任中国对外交往的“桥梁”和“纽带”。智库中的新华人学者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往往还能够扮演“二轨”外交的执行者和推动者。

四、发挥海外智库中新华人学者作用的政策选择

海外智库中的新华人学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同样也是我们在新时期推动中国“软力量”建设的一支可以利用的重要队伍。正是鉴于海外智库新华人学者在中国“软实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以国务院侨办和其他国内有关机构为平台，尽快构建中国海外新华人学者的数据库。目前海外新华人学者和国内的联系大多数通过其个人的积累建立的，比如校友关系、个人纽带等，这种情况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也无法实现资料的有效共享。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仅在日本执教的新华人学者已超过 2000 人，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加坡、英国等地也为数众多，尤其是目前有一大批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正在陆续进入海外智库工作，其影响和规模未来还会继续扩大。我们应当尽早建立海外智库新华人学者的数据库，并不断进行更新，以了解他们的真实发展动态，更好地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来。

(2)、进一步加强同海外智库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国内政策智库机构和海外新华人学者之间的联系；并由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建立海外新华人学者的引进成本与绩效考评机制。近年来，教育部通过“长江学者”计划，引进了一大批“长江学者”，其中有很多都是海外智库中任职的新华人学者。但就整体而言，这种任用与选拔仍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国内对应的智库机构因为缺乏足够的经费和海外校友关系，和国外智库之间的联系往往相对较弱。我们应通过有效的成本与绩效考评机制，一方面加强同海外新华人学者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提高和海外新华人学者交流的绩效。同时，通过专项资金和特殊政策等途径鼓励和支持国内政策研究机构，特别是社科院系统和政策研究部门加强和海外智库的合作与联系。

(3)、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加强和海外智库中新华人学者的联系，构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为中国未来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和外部世界的交流会日益增多，而外部世界对中国了解的渴望也会与日俱增，近年来海外兴起的“中国热”即是明证。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越来越高的对外交流能力，新华人学者不仅熟悉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且早已超出了语言的层面。在这方面，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和鼓励海外新华人学者不违背驻在国政策和法律的前提下积极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属性，鼓励和帮助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不断增强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

(4)、继续加强对海外新华人群体的研究，鼓励和支持在一些新的和相对敏感的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海外新华人学者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群体，他的出现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其影响正在不断

增加，并已经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和台湾的一些学者已经就有关问题开展了探讨，相比之下，由于这一话题相对敏感，大陆学者目前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相对较少。海外新华人学者基本上都来自中国大陆，我们也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新世纪的和平发展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如何让这个群体能更好地为中国的“软力量”建设服务，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针对性研究，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